

“普韦布洛”号危机之所以发生，最直接的动因是朝鲜对美国情报收集活动的应对策略发生了改变。朝鲜是在未预先通知苏联的情况下实施的抓捕行动。

冷战与情报： 美国“普韦布洛”号 危机决策史

COLD WAR



梁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
国际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冷战与情报： 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

Cold War and Intelligence

A History of U. S.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Pueblo Crisis

梁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
梁志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012 - 4754 - 7

I. ①冷… II. ①梁… III. ①朝鲜问题—紧急事件—
对外政策—史料—美国—1968 IV. ①D87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7358 号



书 名	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 Lengzhan Yu Qingbao; Meiguo “Puweibuluo” hao Weiji Jüeceshi
作 者	梁 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 - 65265923 (发行) 010 - 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19 1/4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754 - 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
12CSS006）与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
13JS031）中期研究成果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不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总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 20 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

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辩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其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角色和作用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

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会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2年6月

目 录

总 序 / 1

前 言 / 1

第 1 章 危机前后的误判 / 17

- 第一节 AGER 计划问世 / 17
- 第二节 首航任务风险评估 / 24
- 第三节 从此踏上不归路 / 40
- 第四节 平壤意欲何为 / 46

第 2 章 “我们决定忍气吞声” / 54

- 第一节 最初的激愤 / 55
- 第二节 冲动渐渐消退 / 60
- 第三节 决定走向谈判 / 68
- 第四节 克制的背后 / 80

第 3 章 人道主义 VS 国家利益 / 90

- 第一节 先放人后调查 / 91
- 第二节 “有条件致歉” / 103
- 第三节 “另签” 策略 / 114
- 第四节 最后通牒 / 125

第4章 对话莫斯科 / 139

- 第一节 莫斯科—北京—平壤 / 140
- 第二节 克里姆林宫左右为难 / 149
- 第三节 华盛顿再次求援 / 160
- 第四节 美苏继续沟通 / 170

第5章 另一个战场 / 178

- 第一节 “血盟”形成前后 / 178
- 第二节 朴正熙政府疑虑重重 / 185
- 第三节 美国总统特使访韩 / 197
- 第四节 汉城渐趋平静 / 206

结 语 / 216

附录一：核心文件选译 / 232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 277

后 记 / 292

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事件，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朝政策的一个缩影。它既反映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不成熟、不自信，也展示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固执和偏见。

前 言

1968年1月11日凌晨，“普韦布洛”号悄悄驶离日本佐世保港，迂回前往朝鲜^①东海岸进行电子情报侦察。也许没有人会预料到，这艘美国间谍船的处女航竟是一条不归路。23日，“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遭朝鲜扣押。十一个月后，船员们才得以与家人团聚，而“普韦布洛”号至今依然静静地停泊在朝鲜普通江畔。

“普韦布洛”号危机是美国情报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促使华府下决心大力加强中央情报机构。^②此后，情报界渐渐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本功能为情报搜集、综合、研判和策划实施隐蔽行动：前者的成功范例为1962年10月发现苏联在古巴修建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

^① 除直接引文外，文中全部用“朝鲜”指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② Michael Warner (ed.), *Central Intelligence: Origin and Evolution*, Washington D. C.: CIA History Staff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01, p. 1; Bradley F. Smith, "The American Road to Central Intelligence," in Rhodri Jeffreys-Jones & Christopher Andrew (eds.), *Eternal Vigilance: 50 Years of the CIA*, London: Frank Cass & Company LTD., 1997, pp. 2-16; Robin W. Winks, "Getting the Right Staff: FDR, Donovan, and the Quest for Professional Intelligence," in George C. Chalou (ed.), *The Secret Wa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92, p. 19; William M. Leary (e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istory and Documents*,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p. 19; Roger Hilsman, Jr., "Intelligence and Policy-Making in Foreign Affairs,"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1 (October 1952), p. 2; [美] 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潘世强等译，范道丰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9—51、60—63页；[美] 托马斯·F·特罗伊：《历史的回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和发展》，狄奋、李航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21、28、76页；[英] 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美国谍报史——从安全勤务局到中央情报局》，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226—227页。

1967年5月准确预测以色列即将发动中东战争及其结果；^①后者的成功范例为1953和1954年秘密策划并实施了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左翼政府的行动。^②但另一方面，有时美国的情报活动也会引发对象国的激烈反应，以至于酿成一场外交纠纷甚至军事冲突，“普韦布洛”号危机便是一例。非但如此，此次危机还使华盛顿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情报损失，且一度改变了美国的情报侦察方式。

从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讲，“普韦布洛”号事件同样引人注目。虽然东西方冷战打响后，频繁出现柏林危机、台海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等国际突发事件，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华盛顿并未将处理国际危机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960年代初，处理国际危机日益成为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对外决策的重要职责，也因此受到更多的重视。1962年7月2日，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发布命令，要求全面改善突发事件应对程序。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国际危机管理”的概念应运而生。至1960年代中期，华盛顿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外部危机预警系统。^③“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被俘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及其继任者们进一步将国际危机管理程序制

①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y 23, 1967, in *FRUS, 1964–1968*, Vol. 19, *Arab–Israeli Crisis and War, 1967*,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p. 73–74; Nigelj Ashton, “For King and Country: Jack O’Connell, the CIA,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3–71,”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 5 (November 2012), p. 890; Arlene Lazarowitz,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 Regional Search for Balance: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Middle East, 1964–1967,”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2, No. 1 (January 2008), p. 52; G. J. A. O’Toole,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Espionage: From the Revolution War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8, pp. 103–104; 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8—199页。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可参见 Mary S. McAuliffe (ed.), *CIA Document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Washington: History Staff,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ctober 1992。

② Mark J. Gasiorowski, “The CIA’s TPBEDAMN Operation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5, Issue4 (Fall 2013), pp. 4–24; 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第4—13页。

③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PPC) Chairman Walt Rostow Provides Planning Group Members with a 3/23/1964 Document Entitled: ‘Anticipation of Foreign Crises’,” March 27, 1964,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DRS*), Gale Group, 2014, CK3100629170; “Arthur A. Hartman Memorandum for SIG Members on the Status of Approved Papers on Foreign International Defense and Foreign Crises,” June 4, 1968, in *DDRS*, CK3100097612.

度化，竭力通过与苏联达成谅解的方式防止海上冲突的再次发生，并在处理“马亚克斯”号事件与伊朗人质危机时从1968年间谍船一事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

“普韦布洛”号危机亦是冷战史上浓重的一笔。“冷战”更多地是指一种非战非和的对抗状态，危机便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和朝鲜之间唯一一次通过长时间双边秘密谈判解决的突发事件，它清晰地昭示出“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在约翰逊及其主要顾问脑海中是多么根深蒂固，越南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美国对朝鲜半岛危机的反应和对策，以及维护国家声誉和保持盟国信任的政治考虑如何压制了挽救船员生命的人道主义冲动。同时，此次危机还明显地加剧了美韩和苏朝同盟内部长久以来存在的疏离感，韩朝两国对盟友安全保护的信任度急速下降，以至于在1970年代初彼此伸出了橄榄枝，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一度缓和。

1990年代末以来，美国、苏联、东欧以及韩国均陆续公布了数量可观的“普韦布洛”号危机档案。

1997年，美国大学出版公司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版了《林登·约翰逊国家安全文件（1963—1969）：亚洲和太平洋之第一次增补》，共12卷。其中，第6卷零散地收录了一些有关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的文件，时间段为整个危机时期，总量近500页。虽为未整理文件，利用起来并不十分方便，但毕竟出版年代较早，仍是当时少数可供利用的重要原始文献之一。^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是国内外外交史学界普遍使用的基础史料。2000年，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编辑出版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4—1968）》第29卷第1部分《朝鲜》。这部文件集将“普韦布洛”号危机单独列作为一个专题，共收录120份文件。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为危机初期约翰逊政府的内部决策、华盛顿与汉城和莫斯科的交涉以及美国板门店谈判策略的演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外，该卷收录的其他文件中还有部分涉

^① Lyndon B. Johnson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1963 – 1969, Asia and the Pacific, First Supplement, 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7, reel6, 0257 – 0728.

及 1968 年美韩关系，也是“普韦布洛”号危机研究的必要参考文献。^①

对于部分短期内尚没有条件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总统图书馆搜集档案的研究者而言，《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替代文献来源。截止 2014 年 2 月，该数据库至少收录了 420 份与“普韦布洛”号危机直接相关的档案。尤其需要专门指出的是，《解密文件参考系统》中有一份长达 576 页的题为“‘普韦布洛’号危机外交活动纪事长编”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国务院按照时间顺序详尽细致地记录了 1968 年 1 月 23 日到 9 月 20 日之间约翰逊政府为解决“普韦布洛”号危机所进行的各项外交活动，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②《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个美国档案专题数据库，《美国与朝鲜南北方关系：从尼克松到克林顿（1969 – 2000）》专题包含了少量涉及“普韦布洛”号危机的文件。^③

“普韦布洛”号船只改造、首航任务确定以及危机情报损失评估均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2012 年 11 月 20 日、2013 年 6 月以及 2013 年 7 月，国家安全局分三个批次解密了大量有关“普韦布洛”号危机的档案，核心内容包括“普韦布洛”号概况、首航任务确定、船只被俘前后美国拦截的朝鲜通讯情报、危机情报损失评估报告、国会调查情况、归国船员质询安排、危机教训总结和国家安全局密码史中心（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危机研究报告等。^④总的来讲，这些文献并不系统，与美国高层危机决策关联度也不高，但对于全面了解“普韦布洛”号危机仍有一定助益。

1985 年，一批美国记者和学者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建立了国家安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 , 1964 – 1968 , Vol. 29 , Part1 , Korea , Washington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2000 .

^② “Report by the Historical Studies Division of the Dept. of State Entitled: ‘Chronology of Diplomatic Activity in the Pueblo Crisis ’ ,” October 1 , 1968 , in *DDRS* , CK3100150472 – CK3100151047 .

^③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NSA*) ,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 2014 .

^④ available at : http://www.nsa.gov/public_info/declass/uss_pueblo/ (以下引用均略去网址，简称为 NSA Documents on U. S. S. Pueblo) .

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该档案馆收藏了数量庞大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被《洛杉矶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文献收藏机构”，其出版物包括《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电子书和研究著作。2014年1月23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发布了第453号电子书，题为《“普韦布洛”号间谍船：林登·约翰逊在1968年1月国际危机中的两难困境》，共收录25份文件。^①这批文献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危机初期美国的应急反应计划，让人们意识到1960年代末为应对朝鲜可能做出的“挑衅”和发动的“侵略”约翰逊政府已准备好使用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与古巴导弹危机相类似，“普韦布洛”号事件期间从地区危机到核战争同样仅一步之遥。

研究“普韦布洛”号危机可以利用的美国文献还包括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口述史系列（包括当时参与决策的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总统特使以及驻联合国大使的口述采访资料）^②、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研究报告^③、国会文献^④以及《美国国务院公报》^⑤。

要想深入了解“普韦布洛”号危机的来龙去脉，单方面利用美国档案是不够的，还需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官方文献进行挖掘。早在1991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就建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后来又

^① John Prados and Jack Cheevers (eds.), *Spy Ship Pueblo: Dilemmas of Response in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Lyndon B. Johnson in January 1968*,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453, January 23, 2014.

^② available at: http://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search/Oral_History/oh_search.html.

^③ Ralph E. Strauch, *The Operational Assessment of Risk: A Case Study of the Pueblo Mission*, A Report Prepared for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Project R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March 1971; Robert E. Newton, *The Capture of the USS Pueblo and Its Effect on SIGINT Operations*, United States Cryptologic History, Special Series, Crisis Collection, Volume 7, 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1992; Thomas R. Johnson, *American Cryptology during the Cold War, 1945–1989*, Book II: Centralization Wins, 1960–1972, 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1995.

^④ “Inquiry into the U.S.S. Pueblo and EC-121 Plane Incidents,” Report of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the U.S.S. Pueblo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firs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July 28, 1969,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istorical Series),” Vol. 20, Ninetie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1968,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⑤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